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中文卷（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中文卷（上）

路遥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中文卷. 上/路遥主编.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607-4206-9

I. ①义…

II. ①路…

III. ①义和团运动—史料

IV. ①K256.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7775 号

责任编辑 马银川

美术编辑 张 荔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25010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 毫米

印 张 237.5

字 数 547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全八册) 1380.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审者 邱远猷 王道成

本卷编者 吴松龄 彭淑庆

戴逸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飘渺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

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度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度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

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世界各地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

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序言

路 遥

我国史学界系统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始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所谓“中国近代史”，其概念最初系指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这一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后来史学界将其下限延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也纳入“近代史”范畴之内。“中国近代史”被作为一个重点学科来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正式兴起。它以民族解放斗争结合社会阶级斗争作为主流，义和团运动即其中重大事件之一。

一九五〇年为义和团运动五十周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主持编辑了《义和团》资料四册，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最早出版的一种。翦老在该资料集“序言”中说：“清算帝国主义血账，是纪念义和团的最好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这就是当时编辑这部资料集之指导思想，对义和团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史学研究领域（也包括义和团研究）陷入了非正常状态。迨至七十年代“四人帮”被粉碎，学术界开始拨乱反正，义和团研究又步入正轨。从八十年代开始，由于中外学术交流沟通，义和团研究才开始面向世界。一九八〇年十月，山东大学等五个单位联合发起在济南举办了“义和团运动学术讨论会”，共一百二十多人出席，其中有美、日、加、澳等国十位学者参加，这是义和团研究第一次具有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机构设在山东大学。隔了十年，至一九九〇年，山东大学又联合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等六个单位，再次在济南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共一百三十多人出席，其中有日、美、法、德、匈、波等国二十五位学者。再隔十年，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又一次由山东大学联合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等八个单位，仍在济南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代表近一百五十人出席，其中来自日、美、英、法、德、澳、韩、以色列等国及中国

香港、台湾地区等二十八位学者。通过前后三次义和团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与讨论,对义和团研究有重大的推动。在这二十年内,无论中、日或美、欧,都相继有一些代表性的论著和资料出现,其成绩毋庸置疑。尽管如此,但由于义和团运动具有浓厚神秘性及其现象之复杂性,又由于文献资料之严重阙失,致使义和团研究中有不少重要问题难以突破,甚至停滞不前。其主要难题,有以下几点:

一、以往研究习惯于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的考察,着重于性质的论述,并满足于研究方法上的线性分析。从八十年代开始,研究者已不满足于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要求扩大视野,进一步从剖析社会结构着手。一九八六年在天津由南开大学等单位举办的“义和团学术讨论会”(国内),就已有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那时还是着重于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探索。从社会结构或经济基础层面去探讨这场运动的成因,是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人类历史是具有社会的历史,有社会存在是人类的特征,而人类社会又是以众多群体及其组织为主干,并以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地理等各种要素为其有机构成。所以从社会结构入手乃是深入研究义和团的有效方法,它实是采取历史学同社会人类学相结合,而被称为历史社会学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二、利用“矛盾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理论,以考察这场运动中所体现出来之义和团、清政府与外来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是可以继续遵循的研究方法。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更多研究者仍习惯于从矛盾各方之对抗、斗争,而不从或少从各方之相互制约的发展过程中去作具体而深入分析,把一场极其复杂的历史运动直线化、单一化了,因而也就很难有什么规律性的探索。即以近代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而言,民族矛盾当然是最主要的,而它怎样同社会矛盾相交织而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义和团运动同时期,国内曾爆发过几次规模较大的下层群众反抗斗争,它对义和团运动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至今还未见有分量的论著出现。

三、义和团运动的产生从其历史条件看,主要是因德国侵占胶州湾出现民族危机而激发,同时也是反洋教、反教会斗争之延续与发展;而义和团之反教会斗争,又是同长期之民教矛盾密切关联。民教矛盾从西方宗教一方说,起主导作用的是教会及其传教士。义和团爆发于山东、直隶地区,在这些地区传教的天主教组织,有方济各会、圣言会、遣使会、直隶东南耶稣会与江南耶稣会等。这些修会在义和团运动地区原设有众多堂口,均受总铎区或主教代牧区领导。不同修会所采取的传教方针有什么异同?它吸收教民的手段有哪些特征?各修会同其所在国家的政治关系如何?这些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

尤其当民教矛盾尖锐爆发后,传教士同主教之间、主教同驻华公使、领事之间都有许多公文往来,教会内部更有大量通讯报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整理过《教案教务档》,从中已不难看到大量民教矛盾都因民事、刑事纠纷而涉及司法权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源问题。在各教会内部对此更有不少档案记录,却至今未有任何披露,这是导致“教案”研究难于推进的主要原因。

四、从思想意识方面看,围绕义和团运动暴露了中西方之间在思想文化与宗教信仰之间的重大差异。但不少研究者多习惯于从中西文化差异、冲突去论述义和团与教会之间的矛盾,而很少从基督教会将上帝信仰移植异境时应怎样同乡土文化、民间习俗相调适以化解矛盾这个视角入手,对此西方教会根本不予考虑。义和团运动的主体是中国下层民众的运动,应该考虑到这场运动的中国下层民众意识与民间信仰。所谓“民众意识”,是指特定时期在下层民众中间流行的日常各种意识;所谓“民间信仰”,是指其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而刻印于民众心理结构中的信仰与仪式。就教会一方说,无论其在民间传播或使教民皈依,都莫不以精神征服为指引,其遭到乡土文化抵制与民间信仰对抗乃势所必然。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梵蒂冈曾召开了第二届大公会议,制定、发表了许多文献,对以往传教也有过若干反思与检讨。以之联系义和团运动时期,应如何评价教会的对华传教方针及其所形成的民教矛盾,却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以上仅就我们思虑所及,提出几个问题,并非全面。现所汇编的这套中外文献资料,也可以说是应对于上述研究困境而编辑的。

编辑这套资料也是我多年所愿望,记得一九九〇年十月在济南举行“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之际,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同志曾约我商谈,建议由我主持编辑一套大型的《义和团运动资料汇编》。其途径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集中已出版的零散资料,二是搜索在各地的文献。基于当时条件,我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于负起此重担,但我对此事一直萦回脑际。二〇〇二年国家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二〇〇四年编委会抛出基础工程项目,本课题《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主任大力支持而获得批准,终于实现了我的夙愿。现在这套资料同以往相比较,它涉及面广,有些从海外搜求来,因受经济条件限制,还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要求,但它会给研究者以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拿义和团运动同中国近代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相比,它的神秘性与复杂性远超过其他。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社会危机之外又多出了民族危机,世界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对亚非地区的征服也已开始转向帝国主义扩张阶段;在中国是两个危机交织在一起,而义

和团运动又是中国具有乡土文化、信仰的下层群众所自发的一场反抗斗争运动,其所映现出神秘而诡异的特征乃不可避免。仅从现象上看,义和团运动恰似一面多棱镜,从不同侧面观察,各有其不同特征,但这不等于它没有正面的形象和本质的构成,研究者可以从《汇编》中作各自探析。我们除大量摘录当时中文报刊外,还选译了日、英、法、德等不同语种的文献资料。本《汇编》共分五卷八册,其中:中文资料一卷二册,英、日译文各一卷二册,法、德译文各一卷一册,约计五百四十七万字。其来源主要如下:

一、外国的官方文档,如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文件,涉及日本对华政策以及出兵参与联军共同侵华过程的相当详细记录。

二、西方的天主教内部文献,主要有德国圣言会和法国耶稣会对华传教活动与民教矛盾频发的记载。

三、侵略方的国内舆论,选德、法两国国内有关报刊的评述。

四、选自基督教传教士和西方学者的最早或较早撰述义和团的论著。

以上大部分记述来自与义和团不同的立场,有许多诬蔑义和团为“匪”、“拳匪”、“团匪”等词句,均非我们所认可,为要保持资料之原始性,一概不予改动,它涉及义和团运动诸多方面问题,仍有重要参考价值。限于我们水平,所选译内容与编辑方法当有许多不足之处,尚望研究者、专家批评指正!

二〇一〇年五月

中文卷选编说明

本卷收录的资料选自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海内外中文报刊。一百多年来,从中文报刊角度辑录义和团运动资料者只有两次。一次是1951年出版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由翦伯赞等编辑,以下简称“翦编”)第4册“有关义和团舆论”栏目,选择了5种报纸的35篇评论,约5万字;另一次是1990年出版的徐绪典主编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以下简称“徐编”),选自3种报刊,收录26.5万字。该编之辑录除了选自《中国旬报》外,其他均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室积抄的30余本资料中选出,以《万国公报》和《汇报》为主。以上两次选录均有自己的特色和意义,但从全面、客观的要求来审视,还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本书选辑报刊17种,收录出版133万字,内容涉及史实和评论两大部分。选编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入选报刊的标准和种类

1. 对入选报刊收录内容之时限,以义和团运动高潮期为主,其上限起自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其下限至1901年9月(光绪二十七年七月)《辛丑条约》签订前后。评论内容超越义和团运动全过程,其下限延至20世纪20年代。

2. 对入选的地方报刊,以上海地区出版的为主,兼及北方天津、南方广州,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和海外的日本、新加坡等地。不同地域的报刊对报道本埠及周边地区的内容,具有明显的倾向和区别。

3. 对入选报刊的主办者及其背景,包括外国传教士、中外商人、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留日进步学生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派等多种阶层团体和政治派别,以期从不同视角进行客观考察。

4. 依据上述原则,本书入选报刊大致确定为以下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自1900年至20世纪20年代,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留日学生及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办的报刊,具体涉及《开智录》(1900~1901年,东京)、《中国旬报》(1900~1901年,香港)、《向导》(1922~1927年,上海、武汉)、《湖北学生界》(1903年,东京)、《中兴日报》(1907~1910年,新加坡)和《新青年》(1915~1925年,上海、广州)等。

《开智录》虽只存在了几个月,但其刊载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等几篇文章,是现已发现的最早赞扬、肯定义和团的中文报刊。

《中国旬报》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是当时极少对义和团称“拳民”而不称“拳匪”的期刊。该刊对义和团运动的报道既有史实又有评论,对义和团斗争予以同情、支持的同时,也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军事侵略和清政府的政治腐朽。

除以上两种外,其他报刊均是评论,可以从中考察资产阶级革命派、留日学生以至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义和团运动认识、态度之发展、变化的轨迹,也可发现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作用的印记。

第二部分,自1897年至1908年期间,由资产阶级维新派经办的报刊,如《国闻报》(1897~1899年,天津)、《知新报》(1897~1901年,澳门)、《清议报》(1898~1901年,横滨)和《中外日报》(1898~1908年,上海)等。

第三部分,是由中外商人和教会经办的,集中在上海。对有关义和团运动报道并具有重要影响的有4种报刊:《万国公报》(1868~1907年,上海)、《申报》(1872~1949年,上海)、《汇报》(含《益闻录》、《格致益闻汇报》,1878~1911年,上海)和《新闻报》(1893~1949年,上海)。

以上第二、三两个部分的报刊,除个别外都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全过程,而且前跨后续的时间长,其对义和团运动时期相关内容的报道比较丰富,史实和评论也较为详细。尽管这些报刊从总体看是否定义和团和为列强侵略辩护的,但信息量大且保留了许多可与其他史料相印证的资料;其评论亦有不少发人深思之处,特别是述及列强之间的相互利害关系还是比较客观的。

二、收录内容的说明

1. 本书所收录的文献资料,原文中有不少对义和团充满诬蔑性的词句,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为保持资料之原始性,亦不予删除。

本书所收录的主要内容有:

(1)对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当时中外各方都有一些客观公正的评述,多指出列强侵略是义和团起事的最根本原因,教会干涉诉讼激起民教矛盾是导火线。教会自身对义和团运动后传教策略的调整,亦足以说明其在此之前的宗教扩张性。

(2)对当时全国各地的教案(与南方会党活动有关的不收入)有较全面的反映。除对山东、直隶、京津、乌里雅苏台等地区重点报道(常见材料不收)外,对其他省份也尽量予以反映,诸如盛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省区教案资料也有选录。

(3)对各地义和团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活动有所反映,以不常见资料为主。如对直隶白沟河、板家窝以及山西的义和团情况,京中派人赴山东招老团进京情况,真假拳团、“拳匪”、“会匪”共存情况,以及此后“扫清灭洋”口号的出现,“联庄会”的组织形式并非1902年景廷宾起义所首创等。

(4)关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对策也多有披露,如清政府的“剿抚兼施”政策,对义和团的“赏赐”措施,以及荣禄主谋结拳民以攻西人等。

(5)对义和团的评价。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有公正的评述,即使资产阶级维新派乃至外国人也深受此事件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

现、增强。

2. 收录内容放宽视野,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中外关系诸方面。

(1)不仅注重义和团运动本身,还辑录与其相关的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社会与民族危机、国际关系、列强对华政策与侵略战争等。

(2)对基督宗教的在华传播以及义和团运动后传教策略的改变,充分说明当时民教相仇之根本原因并非中西文化之冲突。

(3)对于列强对华政策及其远东国际关系,也有比较充分的反映,其焦点在于列强对华政策由“瓜分”到“保全”的演化。

(4)对义和团战争有非常丰富的反映。以往的研究多从“运动”角度去考察,而忽视了从“战争”角度进行探讨。义和团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除抗日战争之外,运用兵力最多、耗费时间较长的一次中外战争。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很早就提出了“义和团战争”的概念。综观义和团战争全局,无论是华北战场还是东北战场,当时报刊均有报道和评述。这些资料不仅可与档案史料互为印证,而且还有不少重要补充。

(5)此外还有不少未为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现举一例,如对当时中国各海关的税项纪录,清政府密议加税以及谈判和约所涉及的财政问题等,均有报道和专题评论。

3. 选录内容力求真实,避免已被公认的讹传再现。

谣言和讹传即是一例,本书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把握三点:一是客观反映当时谣言众多的实况;二是对后来已确认的讹传材料,不予选录;三是为保存整篇材料之原貌,而对夹杂其中的零散讹传亦予保留,以反映当时消息真假难辨的实况。

三、编辑凡例

1. 对“徐编”一书已收的《万国公报》和《汇报》资料,除极重要的外,一般不再收录。

2. 已被当时报刊译成汉文的外文记载,其内容重要者作重点选录,不合乎此要求者一律不收。

3. 本卷所选资料的编排方法,以发表时间为序;同一时间内发表在不同报刊者,其顺序则不分先后。

4. 选录的刊载时间以农历为主,西历在括号中写明。凡月中之日发表时间不可考者,排在每月之后;若年中之月不可考者,则放在每年之最后。

5. 本卷所选资料绝大多数都没有标点和分段,我们都一一予以标点和必要的分段。保留原有篇目的标题。即使极少部分原报刊有粗略标点,但多不符合要求,亦予以重新整理、校正。

6. 同篇资料分期连载者,仍分散于各期,不予集中排列。

7. 对本卷所辑资料,错讹或应删除之字加“()”表示,正字或增补之字加“[]”表示;至于一般笔画讹、字形混同的明显误刻,则径予改正;原文残缺及脱漏之字用“□”表示;由于多种原因而无法辨识之处用“■”表示。

8. 资料原有夹注、旁注及眉批等,均置于“()”内;遇有错句或文理不通之处,保留原状,不加改削。

9. 为忠实于原稿并保持当时的行文特点及语言风格,地名、人名及一些固定词语用

法皆未按照现代汉语标准统一改动。国名如“义大利”、“星加坡”、“土尔其”、“非律宾”、“和兰”等；地名如“伦顿”、“斐州”、“海参威”、“墨斯科”、“阿刺伯”、“九洲”及“爱珥”、“吐鲁蕃”、“芦沟桥”、“燕台”等；人名如“李连英”等；词语如“鼓惑”、“要胁”、“平空”、“占踞”、“公同”、“气慨”、“省分”、“繙译”、“豫备(防)”、“妥贴”、“纷烦”、“计(筹)画”、“磁器”、“照像”、“仓猝(卒)”、“了望”、“侵掠”、“记念”、“浅鲜”、“蕴酿”、“无庸”、“澈底”、“宫庭”、“察阅”、“附合”、“连络(袂)”、“情素”、“担误”、“家俱”、“反覆”、“两傍”、“人材”、“显着”、“印像”、“枪枝”、“岂只”、“格杀无论”、“执迷不误”、“养痍貽患”、“惟所欲为”、“返朴归真”、“一面之辞”、“暴虎凭河”、“伏伏贴贴”等。因报刊及作者不同而对一事物有多种写法者，均不作统一处理，如“俾士(斯)麦”、“泰(太)晤士”、“拿破仑(伦)”等。

以上的选录，绝大部分都是从缩微胶卷中查阅的。有些报刊因年代久远，字迹多模糊不清，既无标点，而语法又不规范，甚至还有不少内容脱漏；又由于各报刊之库藏有严格不借阅的规定，致使我们无法做到全面无遗漏的核查，敬请读者见谅。本卷资料汇编从选录、翻拍、打印到简繁体转换，均经多次反复、修改、定稿。华东师范大学刘学照教授曾予指点，山东大学路广正、姜可瑜、刘丰鑫、赵镇平等教授协助阅读，黄晓静副研究馆员、李劲军馆员、李建博士等参与校对，特此致谢！

2010年8月